

纪念《清史论丛》创办三十周年
祝贺王戎笙先生八十华诞

清史论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编

二〇〇九年号

09 年 號

纪念《清史论丛》创办三十周年
祝贺王戎笙先生八十华诞

清史论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编

二〇〇九年号

09 年
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史论丛. 2009 年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43 - 5731 - 1

I. 清… II. 中… III. 中国—古代史—清代—文集
IV. K249.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5850 号

清史论丛(2009 年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编

责任编辑 刘川民

封面设计 丁琳

责任校对 张莲芳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v.com.cn

电子信箱 crt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10(千)字

印 张 21.75

插 页 2(面)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43-5731-1

定 价 4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清史论丛》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戎笙

杨 珍

李世愉

李华川

何龄修

张捷夫

陈祖武

林存阳

高 翔

郭松义

赫治清

主 编 李世愉

副主编 李华川

艰辛的三十年

——纪念《清史论丛》创办 30 周年

王戎笙

“文革”结束之后，历史所的科研人员，和全国人民一样以十分急迫的心情，渴望恢复业务，迅速找回被耽误的 10 年。1978 年 7 月 7 日，历史所召开全所大会，宣布各组室负责人名单，原则上是恢复“文革”前的状况。明清史研究室为第 5 室，仍由杨向奎任主任，王戎笙任副主任。关于研究室的建设方针，向奎同志提出要“分兵把口”，意思是根据研究室全面发展重点突出的需要，室内每一个研究人员都要明确自己的长期研究领域、研究方向，还要明确近期的研究课题。这个意见大家都很赞成，所以“分兵把口”一直是我们研究室建设的指导思想。8 月 2 日，开全室大会，讨论全所全室的科研规划。有的同志建议编写一部“清史”，有的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专题研究不够充分，缺口尚多，主张暂缓，但加强专题研究为编写清史做准备，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由此议及办一个断代史的刊物。考虑到办定期刊物必须有足够的经费和可靠的稿源，还应该有专职编辑人员，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得了的。于是我们采取了一个避繁就简的办法，绕开这些难题，先办一个集刊，一年一本，每集字数不限，三五十万字不等。不设专职编辑，由研究人员兼做编辑，这也是一种学习。集刊后来正式定名为《清史论丛》。

《清史论丛》坚持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办刊方针，以促进清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凡是对有关清史的某一问题确有认真研究，哪怕这种研究成果还不够成熟，但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助于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与探讨，都尽量予以发表。文章字数一般不作限制，欢迎短的，也不拒绝长的。潜心研究、学风严谨、把握学术前沿是该集刊的重要特色。该集刊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颇受学术界的重视。在由中华书局出版期间，一直被作为重点图书出版。中华书局在成立 75 周年纪念时，将其列入《中华书局图书要录》。该集刊发表的文章，在已经发表的清史论著中被大量引用参考，

显示出其学术影响力。《清史论丛》自创办以来，一直被海内外清史研究者、高校及相关研究单位广泛收藏。美国哈佛大学、荷兰莱顿大学、中国台湾“中研院”等许多著名科研机构的图书馆，均将该集刊作为清史研究必备图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清史论丛》从第1辑开始，经常发表各种不同的学术见解。编者也以个人身份，发表自己的不同见解，但绝不以自己的见解判断是非，更不能以自己的见解作为取舍来稿的标准。

编者在前言中热情地表示，“我们希望这种讨论在今后能更进一步开展起来。当然，这中间一定存在大量是非问题。但是，学术中的是非问题，只能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来解决，既不能根据人数多少来判断，也不能根据权力大小来裁决。在学术讨论中，我们一定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文革”刚结束，我们大家对学术探索还是心有余悸，在前言中写道：“攀高峰，需要有勇气。清代的历史，有许多是未知的境界，前人没有探索过的。要在这方面做出成绩来，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二要拿出足够的勇气。”“要大力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怕犯错误。学术探讨过程，是复杂的脑力劳动。既想攀高峰，攻难关，闯‘禁区’，从事一点创造性的研究，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学术活动中的错误，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处理。”这是编者向读者传达的一种心愿，也是向作者表明自己办刊物的理念。

1978年8月31日，在研究如何恢复“文革”前被中断了的几项档案资料工作（如孔府档案、乾隆朝刑科题本、白莲教起义等）时，研究室同仁又提议出版一种不定期的清史资料集刊，出版时定名为《清史资料》，由何龄修、郭松义等同志负责，得到各藏书机构的大力支持，仍由中华书局赞助出版。

改革开放使我们对学术信息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为了掌握海内外清史研究的信息，我们又创办了《清史研究动态》，开始是油印本，折叠、装订、寄发，研究室同仁人人动手。在那信息不畅的年月，虽是油印本，却很受学界欢迎。1982年申请刊号，正式出版，向海内外公开发行人。1979年11月22日，我正参加历史所学术委员会会议，有人递给我一本《清史论丛》第1辑样书，当时的喜悦心情，真难以用语言形容。第2辑的稿子，已在10月8日讨论定稿，来稿踊跃，篇幅倍增。我们对《清史论丛》的前景充满了乐观，认定了是一片光明。在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下，真是一路顺风。好景不长，随着国家经济改型，出版部门改变经营模式，我们的《清史论丛》、《清史资料》、《清史研究通讯》3个刊物都面临停刊的命运。

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撑，《清史资料》、《清史研究通讯》先后被迫停刊，连向读者道别的机会都没有。《清史论丛》怎么办？就此停刊实在于心不甘，清史学界的同行也感到惋惜，正在这进退两难时，著名清史学家，台湾大学教授陈捷先先生慷慨给予赞助，《清史论丛》延续下来了。2002年院部推行扶持重点学科计划，清史研究室申请获

得批准。在受到重点扶持的 5 年里，每年可获得数万元的扶助资金。清史室把这笔扶助资金全部用于维持《清史论丛》。5 年之后，《清史论丛》的生命危在旦夕，清史室的一位同仁不忍心这块园地抛荒，慷慨输液，使它在绝望中又幸存下来。

一转眼 30 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或中年人，现在已是年近花甲或年逾古稀了。有很多人的处女作是在《清史论丛》上发表的，他们的成名作或代表作也是在这里发表的。他们和这块园地一起成长，现在已是副研究员、研究员或博士生导师，这块园地哺育了他们，他们也用辛勤的汗水浇灌了这块园地。我们和他们，与《清史论丛》同欢乐共艰辛。

古人云：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真是至理名言。

衷心的祝贺

《清史论丛》编委会

2009 年快要到了。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说来，这是一个具有纪念和喜庆意义的年份。它是本室系列清史论文集《清史论丛》出版 30 周年，又是本室第二任主任、《清史论丛》第二任主编王戎笙先生八秩华诞之庆。我们深感高兴，回顾了 30 年来《清史论丛》走过的道路，它的成就、挫折和王戎笙先生为本室和《清史论丛》付出的辛劳，又不禁感慨万千。

《清史论丛》的诞生，缘于首任室主任、主编杨向奎先生倡导的通过开辟史学园地，发现和培养人才的主张和积极组织实施的措施。30 年来，累计出版 22 册，堪称本室也是本所一项无可否认的成绩。以一个室微薄之力，主办一种持续 30 年的学术出版物，有短时的停滞、停顿而没有永远或长期的停办、停止，这在本所是一项创举。它使本室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青年人的成果，能够及时向同行和读者展示、请教，鼓舞了全室的进取精神和科学兴趣。《清史论丛》也多少支持了同行的朋友，最明显的是袁森坡先生，从《清史论丛》第 1 辑开始，至接下来的 2、3、4、8 各辑，他都有文章刊登。是不是可以说，他的专著《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最初曾以《清史论丛》为重要园地与同行、读者展开交流呢？袁森坡先生在从业余向专业史学家奋进的过程中，《清史论丛》也从旁使过一点助推力量呢？应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30 年来，《清史论丛》发挥了自己的虽然微小但却实实在在的历史作用和影响。

30 年本是而立之年。但《清史论丛》却不能自诩已到达自立的状态。清史研究室不是物质生产单位，没有经济收入，缺少经费支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清史论丛》从诞生时起（主要是在中华书局卸肩以后），始终因阮囊羞涩而妨碍前进，举步艰难、沉重、蹒跚、狼狈，至今没有脱困。说来也许无人相信，1980 年我们曾申请每辑补助人民币 100 元（是为缓和费用，不是为补贴出版而提出的数字），最后却没有得到批准。我们许多人不得其解。然而《清史论丛》坚持下来了。除了本室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我们不能忘记同行和出版界对这一块园地的扶植和帮助。中华书局最早是无偿出版，而且正常开给稿酬。中华书局只对我们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不要只出一辑就此拉倒

(此点意味深长,可见他们认真);二是保证质量,质量不好会损害两家声誉。中华书局前后共出版8辑,受市场制约,难以为继,被迫中止。其后,《清史论丛》陷入最大困境,没有出版补贴,只能关张了事。但天无绝人之路。新主编王戎笙先生积极寻求赞助。在老朋友韦庆远教授帮助联络下,台湾大学陈捷先教授解囊相助,前后4次及时汇寄美元,辽宁古籍出版社共襄盛举,支持《清史论丛》继续出版5辑。王戎笙先生非常感谢陈捷先教授和辽宁古籍出版社热情、慷慨的帮助,觉得还应另想办法,主动要求陈捷先教授不再汇款。两年后,清史分支学科被列为院重点,略有特别经费拨款,成为《清史论丛》再起的经济后盾。于是我们开展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良好的卓有成效的合作,从《清史论丛》2000年号开始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又将近10年了。

回顾《清史论丛》30年发展的历史,使人感到,与人的成长过程总会经历疾病和灾难的折磨一样,《清史论丛》的成长也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几经考验,甚至濒于夭折的,幸运的是总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顽强地生存下来。这说明培植学术不是件容易的事。从重点学科的少量拨款挤出出版补贴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说它至今没有脱困。要想不隳成业,仍有赖于今后合理合法的营谋。在祝贺《清史论丛》出版30周年的时候,我们衷心希望它真正发展壮大,提高质量,成为专业权威。

王戎笙先生接掌《清史论丛》,正是《清史论丛》陷于进退维谷之际,受命于它的存没难定之时。争取援手,防止倾覆,使其稳定、延续,是首要的目标。那时他的主要职务是新任清史研究室主任,六五规划的清史项目也已布置下来。他团结全室,从容应对,在兄弟单位一些专家的有力帮助下,到1990年已完成《清代全史》前6卷。他又贾其剩勇,组织其他单位未完成的后4卷的写作,使成全璧。1993年,《清代全史》全10卷出版,出色地完成六五规划清史项目第一项的任务。《清代人物传稿》则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清史论丛》继续出版问题也得到圆满解决。全室工作依然呈现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

王戎笙先生原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组成员。他与明清史结缘,始于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特点的课题。1966年初,明清史研究室成立,他奉调任副主任,从此逐渐研治清史。戎笙先生为学,识见较高,视野较广,文字表达运用自如,具有出色的研究功力。长期以来,他主持和参加了一系列集体研究项目的工作,如《太平天国运动史》1册、《清代全史》10册、《清代简史》1册,教育部教育考试中心的中国历代考试资料编纂、历史著作的清代部分(两个项目)、李自成结局研究,等等,都是国家级或院部级或所级重点课题。在开展这些项目的研究时,他精心规划设计,组织班子,研究攻关,执笔著述,最后都出色地完成任务,多次获得奖励。这是他在科研工作中的重要贡献。此外,他还发表了数十篇论文,颇有名篇。其中《赵尔巽与中国古代史学的终结》、《依然是警钟——重读〈甲申三百年祭〉》、《从清初权力斗争疑多尔衮非正常死

亡》等文，写得严谨、深刻，尤称佳作。特别是他为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写的研究报告《李自成结局问题的由来和发展》，是具有重要史学意义的文章。1956年发表的郭沫若先生《关于李自成死难地点的问题》，以及金毓黻先生等《关于大顺军领袖李自成被害地点的考证》的一组文章，以确实有据的可以信赖的考证，确立了李自成殉难通山说符合历史实际的地位，停止了通城说与通山说的争论，推进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统一认识，意义重大。研究报告不仅以科学的方法、严密的逻辑、充分的证据，重新肯定和进一步维护了通山说的权威，继续批评通城说的错误，揭露和批判此前大力推销的石门禅隐说及其学风不正的行径，而且周密地考察了李自成结局问题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指出端正学风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就为将来在同一问题上解决类似的分歧作了充分的准备。王戎笙先生等就李自成结局研究问题所做的工作，比郭老、金先生等所作的考证显然更加深入，其科学意义更加重大。这就说明，在集体和个人项目中，戎笙先生自己的著述也是他对史学作出的重要贡献。

必须特别强调一下戎笙先生在对港台、对国外清史学交流方面所作的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突破封闭格局，把中国史学成就推出去，了解港台、了解国外史学发展，已成为迫切需要。戎笙先生是最早参加接待港台和外国史学家的学者之一，也是较早被美国密歇根大学点名邀请赴美研究清史的学者，多次赴港台进行学术活动的学者，与港台的、外国的学者建立起友谊。他在美国两年，除与美国和港台学者进行交流外，阅读了大量港台学者的著作，编成《台港清史研究文摘》一书，在内地出版后，为内地了解港台学者清史研究成就提供了重要资料，也在港台学者中受到欢迎。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和活动，在信息时代是非常重要的。

兹值戎笙先生80华诞之年，我们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为清史研究的发展续写辉煌篇章。

目 录

艰辛的三十年

——纪念《清史论丛》创办 30 周年..... 王戎笙 (1)

衷心的祝贺..... 《清史论丛》编委会 (4)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室的发展轨迹 林存阳 朱昌荣 (1)

清代的自耕农和自耕农经济 郭松义 (28)

有关清朝八旗人丁户口册的几个问题 定宜庄 (43)

光绪时期的地方政府与科举经费 徐 毅 刘上琮 (50)

“千古极灾”

——嘉、道时期山西、河南和直隶的大地震述略 李尚英 (61)

左良玉“清君侧”的原因及后果 刘中平 (68)

再谈明清之际北南两太子案 何龄修 (81)

刘泽清史事再考 杨海英 (93)

再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面谕》、历代帝王庙与玄烨的道学心诀 姚念慈 (108)

康熙帝事考两则 吴伯娅 (187)

允禩：品性 遭际 时代	杨 珍 (197)
“香妃”的传说	
——大小和卓木政权灭亡后被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的	
历史记忆	艾哈迈特·霍加 (222)
乾隆朝礼制建设的政治文化取向	林存阳 (252)
清代宫廷汉族儒家乐书制作及其意义	邱源媛 (269)
试论雍正、乾隆二帝的理学思想	朱昌荣 (297)
戴震灵异观发微	潘星辉 (314)
邓嗣禹先生《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书后	李华川 (325)
《清史稿·选举志》订误六则	贺晓燕 (330)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社科院 历史所清史室的发展轨迹

林存阳 朱昌荣

改革开放以来的清史研究,在新时代大潮的推动下,步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全新局面。这一全新局面的形成,凝聚了清史学界几代学人的心血和智慧。而作为清史研究队伍的一个重要团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室^①的众多同仁,以其扎实严谨的学风、实事求是的科研精神、勇于创新的治学品格、颇具特色的丰硕成果,为清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和繁荣,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出了值得关注的贡献。

一

改革开放 30 年来,清史室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 1978 ~ 1993 年为第一阶段,也是新时期本室清史研究的奠基阶段。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杨向奎先生即已有计划地着手清史研究的规划,组织研究人员开展曲阜孔府档案和乾隆朝刑科题本的整理与研究等。1978 年清史研究室成立后,杨先生更采取积极措施以推动清史研究的发展。如积极响应 1979 年 4 月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清史规划的发展思路,清史室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共同承担起全国清史研究工作联络中心的重担,创办了第一个清史研究专业刊物——《清史研究通讯》(先为内部资料,1982 年正式创刊),拉开了清史研究新局面的序幕;独自承担起编辑出版《清史资

^① 1954 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时,设明清史研究组,白寿彝、王毓铨任正副组长。1958 年历史研究所一、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1960 年组室编制调整后,清史研究隶属封建社会后期研究组,杨向奎、鄯家驹任正副组长。1965 年,再次调整,设明清史研究室,杨向奎、王戎笙任正副主任。197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历史所再次进行机构和人员调整,恢复“文革”前组室;1978 年,明史与清史分为两个研究室,杨向奎、王戎笙任清史研究室正副主任。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清史研究通讯》1987 年第 4 期。

料》专刊的工作，于1980年8月推出第1辑，此后又连续出版了6辑，为清史基础文献的整理打下了基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与《清史研究通讯》侧重国内外清史研究动态、清史论著评介、问题讨论特别是关于《清史》编纂体例的讨论、有关清史研究工作的批评和建议，以及篇幅较小略有不同，清史室还创办了以清史专题研究为特色的、篇幅较大的学术刊物——《清史论丛》，“开创了由处一级的系、所办刊的先例”^①，从而为学界同仁畅发新见提供了一个重要学术阵地和平台。而为适应研究室新的发展需要，杨先生更提出“分兵把口”思路，以整合研究室的学术力量。他让何龄修先生找本室年轻的科研人员谈话，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给他们定一个课题，作为三五年内进行研究的科研范围。赫治清先生的天地会研究、傅崇兰先生的清代城市研究、李新达先生的清代军事研究等，都是那时确定下来的。凡此艰辛努力和不断开拓，皆为清史室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础。此后，清史室更以1983年长沙史学规划会议上的清史编纂规划为契机，承担起大型集体项目《清代人物传稿》上编、《清代全史》的组织和编纂工作，在国家资助下，不断取得阶段性的重要成果。以何龄修、张捷夫二先生为主编，相继推出《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2、4、6编；以王戎笙先生为总负责人，于1991年推出《清代全史》前6卷，继于1993年推出全10卷本。至于研究室同仁的个人成果，无论专著还是论文，其数量和水准皆有大幅度的增加和提升。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和耕耘，清史室在打造学术阵地、整理基础文献、确定学科发展方向、调整人才结构、深化专题研究等诸多方面，皆取得了显著成效，推进了清史研究的整体发展，从而成为清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二）1994～2001年为第二阶段，也是清史室稳步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1994年，清史室与明史研究室合并为明清史研究室，这一调整，在清史室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转折意义。就治学范围而言，明清史研究室的成立，为明、清断代史的有机结合提供了良好契机，使得本室科研人员的学术视野较前有所扩大，研究领域随之拓展。尤其是，在本室几位年轻学术带头人的倡议下，“明清史研究丛书”得到本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由陈祖武先生任主编，相继推出《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中葡早期关系史》、《近代的初曙》、《王夫之易学》、《清初三礼学》等一批学术成果。而赓续前一阶段的努力，何龄修、张捷夫二先生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又推出第7、9、10卷，有力地推进了清代人物研究的不断深化。《中国史稿》第7册（清代部分），于1995年出版，促进了清前中期史的研究。在出版条件较为艰难的情况下，《清史论丛》仍坚持自己的办刊特色，克服困难，保持了出版的连续性，推出一批

^① 周远廉：《基础扎实 成效显著——记杨向奎先生的施政及其成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75页。

颇具学术价值的论文。此外，清史室还主办、联合承办、参与了一些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成为清史学界一支较为活跃的力量。

（三）2002 年以来为第三阶段。2002 年，清史与明史再次分设研究室。2002 年底，以清史室为依托的“清史学科”，被批准为院首批重点学科之一，开启了本室发展的新阶段。在“清史学科”建设的带动下，清史室的发展呈现出如下一些新的态势：第一，规模扩大，整体素质提升。这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科研梯队渐趋优化。现有研究人员十余人，其中 40 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占到一半，全部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科研梯队已基本实现老、中、青三代结合，这为清史学科的科研工作具有较强后劲提供了保证，也是本室在人员结构方面的一个优势所在。二是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涉及清代学术文化、政治、典章制度、妇女婚姻、中外关系史等方面，其中不少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优势。第二，承担了一批院重大、所重点课题，以及其他一些科研项目。2002 年底，随着国家大型《清史》编纂工程的启动，清史学科的部分同仁，或直接参与项目的负责工作，或承担主持如《典志·科举志》、《传记·康熙朝下》、《通纪·考异（上）》等项目的撰写任务。第三，创建“清史学科网站”（www.qingstudy.com），举办“清史研究学术沙龙”。作为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史学科网站”自 2004 年创建以来，在学科成员的共同经营下，一直处于顺利而有序地更新、运行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本学科学术收获的新进展，而且为清史研究的整体发展，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沟通、互动的视窗。同时，本学科坚持定期召开“清史研究学术沙龙”，或做主题讨论，或邀请国内外学者演讲，从而为学科同仁交流学术信息、开阔视野、立足前沿提供了一个有效平台。

二

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双百”、“二为”方针的指引下，清史研究无论就学术发展客观条件的改善，还是具体研究中观念、视野、方法、材料的更新和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等，皆取得了长足进步，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态势。在此氛围之下，清史室的科研工作，亦展现出新的跨越。其主要表现为：

（一）10 卷本清史断代史的推出。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清史研究发展的需要，以及研究的纵深拓展，清史学界对断代史清史的编纂给予高度重视，一大批成果纷纷推出。如郑天挺先生著的《清史简述》和主编的《清史》、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清史简编》课题组编的《清史简编》、杜家骥先生著的《清朝简史》、李治亭先生主

编的《清史》、朱诚如先生主编的《清朝通史》，以及《清史编年》和两部同名作《清通鉴》的编辑，无论立意、架构，还是学术视野，皆各具特色。而一些中国通史著作中的清代部分，如蔡美彪先生等著的《中国通史》第8、9、10册、何龄修和郭松义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7册、周远廉和孙文良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10卷等^①，亦对清史断代史的研究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②。其间，王戎笙先生主持的《清代全史》的面世，更体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其10卷本的篇幅远远大于其他同类著作；二是本著作立足整体清史视野，将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及清入关前史整合为一体，突破了以1644年和1840年划界的论述框架。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学界较大反响，如王钟翰先生曾指出：“就大规模而言，可以超过萧著《通史》的，国内恐怕只有前几年才出版的《清代全史》一部，可以说萧著出版六七十年之后，没有产生与之抗衡的著作。”^③庄吉发先生所撰《〈清代全史〉与清史研究》一文亦多有推誉，认为各卷力求放眼世界，注意信息，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吸取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有所创新，亦有所突破，确实是一部足以反映现阶段大陆清史研究水平的学术专著。正因如此，该10卷本于1993年推出后，旋即于1995年再次印行，又于2007年被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再版。

（二）打造学术阵地。改革开放以来清史研究繁荣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清史学界相继创办学术刊物、推出系列研究丛书，以展示学界同仁的研究创获。于此，清史室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联合创办《清史研究通讯》、率先推出专业清史研究刊物《清史论丛》、发起出版“明清史研究丛书”等，即其艰辛努力的集中体现。尤其是《清史论丛》，自1979年创刊以来，始终以较高的学术水准与严谨扎实的文风，受到学术界的瞩目和海内外人士的好评。而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之一的“清史学科”的成立为契机，清史室还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创建了自己的专业网站，为学科成员发表新得、了解信息、与清史学界同仁互动，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三）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清史研究的起步和不断发展，是与文献资料的持续拓展相伴而行的。早在“文革”之前，杨向奎先生即组织和带领研究人员，开始对曲阜孔府档案和乾隆朝刑科题本进行整理。经过多年的梳理和研究，遂于20世纪80年代初相继推出《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清代

^① 详参赵云田：《20世纪通史中的清史研究》，“中华文史网”。

^② 高翔在《五十年来清史研究》一文中曾指出：“断代史清史专著的大量撰写和出版，不但促使学术界站在理论的高度，从综合性的角度，全面把握清史发展的脉络，探寻治乱盛衰的根源，而且它使我们的教师和学生终于有了可供选择的多种清史教材和参考书，对于清史研究后备力量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清史论丛》1999年号，第55页）

^③ 王钟翰：《王钟翰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7～48页。

地租剥削形态》等著作。7 辑《清史资料》的整理出版,更为学界同仁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稀见的清史原始资料和专题资料。杨向奎先生所著 8 卷本《清儒学案新编》,学术思想史料的选辑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此外,清史室同仁还点校整理了一些清代人物的文集、年谱等。

(四) 关注学术发展动态。对学术发展不断加以总结和反思,是学术研究得以前进的基础,更是学术自觉和理性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不少清史学界同仁即致力于此项工作。清史室的同仁于此付出了很大努力。如冯佐哲与冯尔康二先生合著的《清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高翔先生的《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清史论丛》1999 年号)、何龄修先生的《清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 年第 1 期),以及《中国史研究动态》刊登的许多出自清史室同仁之手的清史年度综述等。这些文章,既对清史研究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展示和肯定,又对其间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揭示,从而为学界同仁的进一步思考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五) 学术工具书的编纂。工具书的编纂,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由清史室许曾重、赫治清、冯佐哲、林永匡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杜文凯等先生共同编辑的《清史论文索引》,收录了 20 世纪初至 1981 年约 80 年间有关清代论文(截至鸦片战争前后)篇目两万条左右,总计 144 万余字。迄今为止,在关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清史研究的诸论文索引中,该书一直以信息含量大、资料齐备、准确而受到学界的重视。王戎笙先生主编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 6 卷(清),收集经、史、子、集、方志、档案、碑刻、书函、报刊乃至口碑材料中有关清代考试活动的文字、文物、图录资料,以分类编年形式组织、编排,非常便于学人检索利用。王先生编写的另一学术工具书《台港清史研究文摘》,摘录了台港学者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 35 年中发表的论文 1000 余篇、专著 200 余部,涉及作者 100 余人。该书在附录部分,还对台港一些重要学者的生平和主要学术成就作了简要介绍,是较为全面反映台港清史研究状况的重要参考书。此外,清史室同仁还参与了《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等辞书的编写工作。这些努力,为清史研究者作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

(六) 举办、参与清史学术会议。改革开放之后,以 1980 年“首次国际明清史学术讨论会”和 1981 年“首届全国清史讨论会”成功举办为契机,各种类型的清史学术会议遂逐渐展开。作为清史研究的一支生力军,清史室同仁不仅积极参与诸如清史国际研讨会、全国清史研讨会、清代宫廷史学术讨论会、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研讨会、清文化学术研讨会、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还发起主办或联合主办了一些学术会议,如“清代政治变革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第十届清史国际研讨会暨第七届清官史研讨会”、“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